

一、日伪统治覆亡

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东北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告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完全陷于孤立。这时，日本帝国主义预感末日的来临，在中国还力图挣扎，制定了“阻拦华南，决战华中，退守华北，死守东北”的作战计划，但已无法挽回败局。特别是在华北、山东、苏北、苏中战场，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围攻下，日本侵略军只有龟缩在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在东北，八路军已开进热河地区作战。在太平洋战争已接近日本本土作战，苏联根据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即将对日发起攻击。东北抗日联军为配合苏联出兵东北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同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做了对日作战的准备。1945年5月6日到7月31日，从西线调到东线的兵力有二个方面军指挥机构，四个集团军，共有27个师、12个旅、若干独立兵团以及特种部队和技术兵种，使远东苏军的兵力增加了一倍。接着，在伯力成立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的远东苏军总部，下辖三个方面军（后贝加尔湖、远东第一、二方面军）及

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分舰队，总兵力达 150 多万。

这些军队拥有 26 000 多门炮，5 500 多辆坦克和自动火炮，3 800 多架飞机，500 多艘海军舰艇和 1 500 多架海军飞机。

当时，在我国东北地区以及驻朝鲜北部、库页岛南部的日军共有六个军和一个航空兵军，计 24 个师又 12 个旅及其他独立部队，共 70 余万人，伪满、伪蒙的 8 个师又 12 个旅，约 20 万人。总兵力近 100 万人。被称为皇军之花的关东军，今非昔比，数量虽然不少，但因支援太平洋战场和准备本土决战，许多训练有素的关东军精锐部队已抽调出去，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它的战斗力。

关东军总司令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苏联从欧洲向远东调动兵力，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判断苏军最早要到 1945 年 9 月以后或在 1946 年春季才可能发动进攻，因而对防御计划迟迟没有决定。

1945 年 6 月 6 日 8 时 15 分，美机 B-29 两架飞临日本广岛市上空，用降落伞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立即发出震耳欲聋的大爆炸，顷刻之间，卷起巨大的蘑菇烟云，全市化为火海，当日死伤 12.95 万人，建筑物大部被毁。9 日上午 10 时 30 分，美机又在日本长崎市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当日死伤 6.67 万人。

美国两次向日本投原子弹，目的在于想利用这种威力很大的新式武器，迫使日本投降，但原子弹并没有使日本屈服，他们仍在继续以东北和朝鲜为依托进行本土作战。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正式宣布作战。当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通知他说：“日本仍在继续战争，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因此，日本政府请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了一切根据。苏联政府遵守对联合

国的义务，接受联合国的要求，宣布从 8 月 9 日起，苏联将认为自己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8 月 9 日零时过后，苏联百万红军分三路进入东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长达 4 000 公里的战线上，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西路是苏军主要的突击方向，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湖方面军主力由蒙古东部出击，长驱直入，通过沙漠区，翻越大兴安岭，三昼夜前进 360 公里。12 日进鲁北、突泉一线，攻克日军满洲里筑垒地区后，抵多伦、张北。19 日，红军主力前锋进抵长春、沈阳附近；左翼攻占齐齐哈尔，右翼进占张北、承德、赤峰等地，从而切断了关东军和华北日军的联系。

东路，由麦列次科夫元帅指挥的远东第一方面军经过激战，连克城镇，直逼牡丹江市，方面军主力则迂回牡丹江，向吉林、长春发展。

北路，由普尔长耶夫大将指挥的远东第二方面军，在黑龙江分舰队的协同下，强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突击，牵制和歼灭关东军第四军。19 日，北线苏军已攻占佳木斯、依兰。此外，远东第一方面军南翼部队在太平洋舰队配合下，切断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联系，并向朝鲜北部进击。

在苏军强大的攻势下，关东军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皇军之花”日本关东军被迫投降

1945 年 8 月 9 日 1 时，驻守在牡丹江的日军给关东军司令部打电话报告，东宁、绥芬河正面的苏军开始进攻，1 时 30 分左右，苏联几架飞机空袭长春。鉴于这种局势，关东军总司

令部乃于凌晨 3 时下达了应急的“关东军作战命令”：

（一）东正面苏军已开始进攻。

（二）各方面军、各军及关东军直辖部队，对各入侵之敌务必尽速排除。

当时，关东军对苏联的进攻意图还不十分了解，是全面正式进攻，还是局部的或暂时的进攻，一时还不能肯定，应该说对苏作战无论是从物质方面准备或者是心理准备，都远不充分。因之，当时还没有下达按作战计划发动全面作战的命令。但很快就得知苏联已经对日宣战，并判明苏军全面进攻已经开始，于是，在早晨 6 时，关东军总司令部便下达了全面的作战命令：

“各方面军、各军要根据关东军作战计划粉碎各入侵之敌。”

由于害怕拂晓之后苏联空军会进行大的空袭，关东军司令部的主要人员匆忙地移往南岭战斗指挥所。是月阴雨连绵，东北全境都沦入了腥风血雨的新战场，天昏地暗，人心慌慌，不可终日，预示着关东军末日的来临。

8 月 9 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对苏作战命令：

（一）苏联对日宣战，从 9 日零时以来，满苏国境方面随处都开始了战斗行动，其规模尚未扩大。

（二）大本营将利用国境方面所在地兵力粉碎敌之进攻，同时尽速准备发动全面对苏作战。

（三）第十七方面军（朝鲜军），并入关东军战斗序列。

（四）关东军总司令官，当前要以国境方面现存的兵力粉碎敌人进攻，同时尽速准备发动全面对苏作战。

关东军于 8 月 10 日，下达了全面执行大本营指示的命令。9 日、10 日两天，苏军几乎越过整个战线发起进攻，从东满、

朝鲜北部、北部正面、西部国境汹涌地杀来。11、12、13日，苏军以其优势的兵力继续进攻，关东军总司令部被迫移往通化。这时，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来到司令部，请求把新京（长春）作为不设防城市。对此，秦彦三郎总参谋长回答说：“作战是不能受政治左右的。”并以总司令官不在为借口，婉言拒绝。

大部已转移到通化的关东军总司令部，8月14日上午开始研究今后整个作战指导问题，但在午后，留在新京（长春）负责情报的第二课参谋野原博起中佐接到电话：“东京将有重大问题，总司令必须返回新京”。这样，山田大将等人于傍晚从通化返回长春。夜间接到大本营的电报，告诉他们“明天15日正午，将有重要广播，请收听”。

1945年8月15日正午，在关东军总司令部里，其主要成员收听了日本天皇的所谓停战的投降诏书，一致仰天大哭。8月16日半夜，召开了决定关东军命运的幕僚会议。会议地址设在三楼会议室。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坐在正中的位置上，总参谋长秦彦三郎坐在他的身后，会议便立即开始了。会议就抵抗和停战（投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彻底抵抗的主张占了上风，会议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充满了沉痛和悲哀。

听完了与会者的争论后，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表示了态，他说：“我们作为军人，除服从陛下，别无忠节之道可言，否则，将永世成为乱臣贼子。那些顽固坚持抗战的人，最好是先把我的头砍下来，然后再进行。”这时，全场肃静下来，只有哭泣声在室内回荡。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接着说：“诸君心情我十分理解，可是圣断已下达，军队只能遵奉圣旨，为结束战争而竭尽全力。进也好，退也好，只有一条奉公之

道，照参谋长的意见办，服从圣断。”

为了促使日关东军早日投降，苏军后贝加尔湖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派空降兵部队护送苏军全权代表，空降长春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就关东军无条件投降问题进行谈判，发出最后通牒。

后贝加尔湖方面军选派司令部作战处长作为去长春关东军司令部谈判的全权代表，司令员马林诺夫斯基签署了全权代表证书。证书写道：“持证人阿尔捷缅科上校作为我们全权代表前往接受长春守备区日满部队以及驻防长春地区的部队投降。我的全权代表阿尔捷缅科上校对长春地区所下达的一切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随同阿尔捷缅科上校前往者有 4 名红军军官和 6 名红军列兵。

8 月 18 日 7 时 45 分，方面军司令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到机场欢送军使团和护送的 500 多名空降兵。他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同志们，你们担负着重要的国事和军事任务，这在军事历史上，在战争实践中，是一项复杂，不同寻常的任务。阿尔捷缅科上校作为苏军指挥部全权代表同你们一道前往长春，到关东军司令官的大本营，向山田乙三将军和张景惠总理递交敦促满洲全部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缴械的最后通牒。”

18 日 8 时，军使团的全部人员和 500 余名空降兵将士登上了飞机，在 9 架歼机的护航下，飞越大兴安岭，到达通辽，翌日 8 时由通辽直飞关东军大本营长春。

为了保证军事团的绝对安全，8 月 19 日凌晨，马林诺夫斯基给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发去了一封电报，要求日军必须保障和担保这次飞行安全。当军使团的飞机接近长春市上空时，负责护航的歼击机接到命令，用 6 架歼击机从空中封锁日军机场，另外三架歼击机为军使团护航。是日，中午 12 时，长春

市上空浓雾弥漫，细雨绵绵，军使团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一列列停在机场上正准备起飞的日军飞机的中央。

阿尔捷缅科走下飞机约 30 分钟后，便乘上由运输机卸下来的自备汽车前往关东军司令部，同山田司令进行谈判。苏军代表当即提出：“立即在全线停火和停止抵抗，放下武器，迅速撤出长春及其附近地区的所有部队，到指定地点无条件投降。并要求通过电台向东北人民宣布日本关东军投降。但是，山田乙三还在拖延时间，用种种借口，妄图把无条件投降说成是停战谈判。

这时，苏军后贝加尔湖方面军已命令运载 500 多名空降部队的重型飞机进入长春市上空。一名日军值班军官匆忙跑来向山田报告这一情况，山田当时感到很惊讶，立即向苏联代表提出责问：“这是什么意思？”苏军代表阿尔捷缅科回答说：“这些飞机是我叫来的，是帮助进行谈判的。不管你们要采取什么行动以及对我的态度怎样，假如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肯定的结果，那么，被你变成为军事堡垒的长春市及其城郊将要遭到破坏性的轰炸。同时阿尔捷缅科上校和在机场值班的苏联军官通了电话“命令轰炸机在上空巡逻飞行，等待我的信号，如到约定时间不见我们的信号，立即进行轰炸。”

苏军代表的严词相逼，使山田乙三完全丧失顽抗信心，被迫接受了苏军的要求，发表了投降讲话，并签署了关东军无条件投降的投降书。

据此，驻长春市的 1.5 万名日军从 8 月 19 日开始陆续解除武装，在前线的许多地区，关东军各部也纷纷放下武器。1945 年 8 月 19 日，苏联红军开进了伪满首都，也是关东军的老巢长春（即新京），曾经蛮横不可一世，残忍狂暴的关东军完全崩溃了，关东军的名字消失了，它的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

被苏军押送到苏联伯力战俘营，等待着历史的审判。

一幕傀儡戏草草收场

关东军的崩溃，使伪满政府感到末日来临，人心惶惶，一片混乱。“新京”（伪首都，今之长春）出现一片大逃亡的景象。

从 8 月 9 日上午开始，在长春街上就有三三两两的马车，满载着行李物品向市外驶去，这是为了求生而逃难的日籍市民。

同日 9 时左右，伪皇宫缉熙楼上，西前间那台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当时溥仪正在酣睡，谁敢来干扰呢？但这次电话却长时间响个不停，直到把溥仪闹醒。溥仪很不耐烦地抓起听筒，原来是关东军司令部打来的。电话中说，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正在由大连返回“新京”的飞机上，一会儿下机后，就要进宫向“皇帝陛下”通报重要情况。溥仪已不可能再照例睡到中午，便提前起来了。

等到接近中午时分，随侍向溥仪报告说，山田乙三大将、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和吉冈安直来了。溥仪吩咐在同德殿接见。溥仪在接见地点的选择上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因为那里距离防空洞最近，便于躲避空袭。果然，他们还没有谈上几句话，就响起了空袭警报，这几个日伪的首脑人物便争先恐后地钻进了防空洞，直到警报解除后，才又回到同德殿继续谈话。

神情沮丧的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对溥仪说，日本由于“战略上的关系”，将退守南满，再准备同苏军“决一死战”。因此，让溥仪当天带领家属等迁往通化大栗子沟。溥仪因为皇宫同行的人员和携带的物品甚多，便低三下四地哀求多给一点准

备时间。吉冈安直（伪帝的“御用挂”关东军派来监视溥仪的）很不高兴，恶狠狠地对溥仪说：“你如果不走，苏军来了，一定会首先把你杀掉。”在这种形势下，溥仪被迫只好同意退走通化的计划，但又向吉冈请求说，希望能让他的弟弟溥杰等人一起到通化大栗子沟去，吉冈感到他的威胁已经奏效，便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溥仪的请求，同意缓期三天，并立即通知伪满军事部，把溥杰等人调任伪宫内府侍从武官。

第二天上午，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传谕召集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伪尚书府大臣吉星和伪侍从武官长张文铸五个人入宫，由熙洽传达溥仪将出走大栗子沟的决定。传达后，这五个人认为此事很有斟酌的必要，乃一起去见溥仪。溥仪无可奈何地对他们说：“是山田亲自来告诉的，先赴大栗子，再转赴日本，已经答应山田了。”五人听后，知道溥仪已无法改变局面，只好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山田乙三，这次山田讲话还算客气，他说：“事情已落到这样地步，不能不离开新京了！”

接着，由张景惠和臧式毅主持召开了伪满州政府“防卫会议”，煞有介事地宣布：伪满军民总动员，加强防空设施，协同皇军作战。同时，根据山田司令官的命令，将伪满政府划分为撤退和留守两部分：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吉星、张文铸、刑士廉、阮振铎、于静远、卢元善和阎传绂等人去通化大栗子沟办理政务；而于镜涛、金名世、黄富俊、谷次亨等人留守长春办理政务。最令人可笑的是这次实质上是散摊的会议，还通过了一部冠冕堂皇的《满洲防卫法》。

会议一散，伪大臣们便赶回家收拾行装。8月11日，是“宽限三日”的最后一天了。这天清晨，人们看到，悬挂在关东军司令部门前的菊形纹章消失了，这就是历史性的大溃逃开

始的标志。

从 8 月 10 日开始，关东军就决定开设专列火车首先运送撤退的日本军人及其家属，接着就是伪满机构中的日人官吏和特殊会社的人员及家属。日本在长的一般职员和市民，也从四面八方背包提箱涌向火车站，有的抱着孩子争抢地挤向站台，准备外逃。

伪满皇帝和宫廷更加混乱。8 月 11 日伪满政府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决定迁往通化，12 日凌晨，溥仪等人在长春登上“展望车”，所谓展望车就是溥仪在“巡幸”时的专用车厢。不过这次也不大讲究了，车厢一半摆着沙发和办公桌椅，另一半地方仍是座位。溥仪坐在沙发上，有专人守护在车厢门口。因此，这节车厢一直是秩序井然，其他车厢可就乱了营了，孩子哭、老婆叫，一片凄惨的溃逃景象。

乘坐这列专车的，除溥仪的家族人员外，还有许多伪满的头面人物，有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参议长张焕相、井上忠也、高桥康顺以及伪满总理张景惠、大臣卢元善、阮振铎、于静远，还有伪满兴安局总裁巴特玛拉布坦等人。

列车像个爬行的蜗牛，走走停停，速度很慢，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开到通化。列车到达通化后，溥仪发现这里如临大敌正在戒严，大有“弓上弦、刀出鞘”之势。原来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兼驻满全权大使山田乙三大将正在这里，并特意登上这列火车晋见溥仪。

火车从通化开动，又在崎岖不平的山岭中间爬行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才于 8 月 13 日的清晨到达大栗子沟。大栗子沟地处临江县境内，青山绿水环绕，风景如画。这里有一家日人兴办的铁矿公司，它早筑成了严密而坚固的钢筋水泥地下室和地

下道。因此，溥仪到达后，就将该公司的办公室和住宅改为伪皇帝的“行宫”。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亲自宣读了“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7日，由日人伪总务长武部六藏主持，导演了一场伪皇帝“退位”的丑剧。

事先，由日人高仓用日文起草了“退位诏书”，然后译成中文。当天晚上，在大栗子沟矿山公司的食堂里，召开了一个国务院临时会议。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汉奸们坐在破椅子上，个个面无人色，连张嘴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室内笼罩着令人难以形容的悲观失望的沉闷气氛。

会上，先由武部六藏讲了当时的形势和日本天皇的停战协定，接着张景惠讲话。他哽咽着说：“事到如今，对满洲国来说，已是失掉了依靠和存在的意义，我想应由‘皇上’自动退位，来给满洲帝国以最后终结。”大家没有异议。张景惠便与臧式毅、熙洽一起捧上“退位诏书”去见伪皇帝溥仪。溥仪立即批准了“退位诏书”，同时又由伪尚书府大臣吉星捧上“玉玺”加盖印章。随后在二楼一个布置好的小屋子里，由身着伪满军服和带着兰花颈饰章勋章的溥仪，站到一张旧桌子前开始宣读“退位诏书”，足足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念完之后，溥仪面带着泪痕向伪大臣们说：本人基于日满一德一心的大义，现在退位，希望各位今后注意自己的身体，如有幸长生在世，想或许能有再见面的机会吧！”说完便离开桌子走到伪大臣们面前一一握手告别。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导演建立伪满洲国的一幕傀儡戏，便草草地收场了，它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殖民统治的覆灭。

“退位”这场丑剧演完之后，吉冈吩咐溥仪，立即准备赴

日。张景惠和武部六藏又告诉溥仪说，在伪满政府的剩余经费中已拨出 3 亿日元汇往日本，作为溥仪在日本的生活费用。但因飞机少，只能带少数随员。于是溥仪把皇后、贵人、乳母以及几个妹妹全部留在大栗子沟，一起去的只有溥杰等 13 人，包括吉冈安直在内。

8 月 17 日，溥仪等人从大栗子沟到了通化。溥仪等人吃完早饭后，很快被送到等在那里的列车上，谁也不敢问这辆列车将要开到哪里去。一直等了好几个小时，才听到吉冈安直传出的指示：“到通化机场去！”于是，溥仪等人又从火车上下来，钻进几辆小轿车，驶往通化机场。

机场有三架小飞机正在等着这些人。其中一架是军用飞机，保险系数大一些，有 8 个座位，溥仪和溥杰登上这架飞机。飞向哪里呢？吉冈说：“先飞到沈阳去，在那里换大飞机转赴日本。”实际上，当时沈阳的机场已被苏军所控制。

飞机停稳在沈阳机场的跑道上之后，溥仪走出机舱，一行 13 人立即被领到机场内一幢小楼房的楼上客厅里。就在这时，苏联的军用飞机却接二连三地在机场着陆，一批批手持冲锋枪的苏军空降部队从飞机上下来，迅速地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楼梯口和走廊的日军岗哨也换上了苏联的士兵。

当时在场的人都被这种局面吓呆了，溥杰心里想：万事休矣！溥仪还不得像尼古拉第二？我们也得白白地陪着去死。

一会儿，一位苏联将军来了。恰好，日本“神官”桥木会几句俄语，他就当上了临时翻译。对话是在苏联将军和“御用挂”吉冈之间进行的。一个说，我们要上日本去；一个说，不行，只有到苏联去，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溥仪坐在苏联将军对面的沙发上，一再向苏联将军打手势，递眼色，表示不跟日本人走，愿意上苏联去。

事情很明显，日本一投降，苏联就指名要溥仪。送到沈阳机场，就是让苏联接收。所谓换乘大飞机去日本，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可笑的是，连“御用挂”吉冈，“神官”桥本，也被一起蒙在鼓里。那位苏联军官对溥仪倒是很客气，和颜悦色，并和溥仪握手，把他们一行人带领到一架去苏联的大型飞机上，被押进了苏联的伯力战俘营。

伪满大臣的可耻下场

苏军进入东北消灭关东军之后，进驻了东北大中城市，一律实行军事管制。苏军进驻长春后，于 8 月 20 日在伪协和会中央本部成立了长春城防卫戍司令部，苏军加尔洛夫少将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将领黄绍元中校（即周保中）任副司令，同日，用中、日、苏三国文字发布文告，对长春实行军事管制。规定：

- （一）从即日起，由苏军卫戍司令长官负责长春的治安。
- （二）以苏军的名义，保障长春市的各国人的生命财产。
- （三）官厅、会社照常继续执行公务。
- （四）要绝对服从苏军的命令，违者严惩。
- （五）下午 8 时以后，禁止一般市民外出。

苏军在对市政机关实行管制的同时，对长春站仓库、“中央银行”、关东军兵工厂、关东军汽车厂及其重要建筑物等进行接收，一些重要物资设备被运往苏联。

在苏军进驻长春前后，伪满大臣们追随其主子在溃败和逃亡过程中，仍企图苟延残喘，以求一逞。8 月 10 日，伪勤劳奉仕大臣于镜涛以长春市市长身份做安民的广播讲话，号召市民不要轻举妄动，要安分守己，等待“中央接收”，还对境内

的日本人作了一番安慰，告诉他们不要害怕，有于镜涛在一天，对日本人生命财产就负责一天。于镜涛怎样由勤劳奉仕大臣变成市长了呢？其中自有奥妙。当他得知伪政府要分为撤退和留守两部分的 消息后，就开始活动。他与张景惠的关系很好，因此，便以张的名义，通过松本盖雄秘书官，请求派他为长春市市长。这一请求得到同意。他认为市长是地方官，无论谁来接收都得利用他。

于当上市长之后，就以市长身份向重庆发报称：“长春市一切市政由于镜涛接收等待中央来。”同时，还将伪简任级、荐任级 80 多名官员收罗来安置职务，并用金钱进行拉拢。

伪满时期出任南京伪大使的吕荣寰，在日本投降后，首先出头组织了东北维持会。他召集伪大臣荣厚、蔡运升等人在他家开会正式成立维持会，并由他担任维持会会长的职务。他当上会长后，便展开了和于镜涛争夺长春市的建筑物和伪满留下的政府经费的斗争。

8月18日，一周前随溥仪逃往通化的以张景惠为首的伪满洲重臣也回到了长春。张景惠一回到长春，便听于镜涛说，吕荣寰已把维持会建立起来。他非常恼火，大骂道：“我几天不在家，他们都反了！”于是立即在他的家里由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治安维持会的成立大会。到会的有邢士廉、黄富俊、阎传绂、卢元善、谷次亨、于镜远、阮振铎、吕荣寰、于镜涛及武部六藏、松本益善等人。会议推选张景惠为会长，吕荣寰、于镜涛为副会长。

这个新的维持会成立之后，立即通过电台发表了声明，表示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迎接“中央”前来接收。

当苏军进入长春之时，张景惠也表示“友好”，他以为只要混过苏联这一关，事情就好办了。当时有一家报纸以“张逆

景惠如此昏聩”为题，“不知自己妻妾有几，天时是晴是雨”为导语，发了一条颇有讽刺意味的报道：

《合众社 26 日电》行将就木之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老而糊涂，竟莫辨天时之晴雨，于苏联军队进驻长春之日，张氏当即率领大批官员前往表示欢迎。某苏联军官为欲从此欢迎代表团中获得消息起见，曾以长春境内的日军总数及其来踪去迹，质诸张氏，张氏随即答称：“请君原谅，余未有所闻”，此苏联官员在盛怒之下，复询问张氏究有妻妾若干，张氏先答以三，复答以二。此苏联军人在忍无可忍之下，乃击桌厉声斥曰：“汝可知今日天气之晴雨否？”张氏以手搔头，踌躇有顷，乃答曰：“天正晴也。”不知张氏看完这篇报道后有何感想。

在这历史转折重大关头，这些伪满大臣们无不费尽心机地考虑自己的前程和出路，无论是伪装自己或登台表演，或隐匿于暗中，但都不能改变他们的汉奸身份，等待他们的只有历史的判决。

苏军进城实行军事管制以后，就开始了对战犯的调查和摸底。

8月25日，苏军采取行动。当天，苏联卫戍司令部通知伪满大臣到原关东军司令部（今中共吉林省委所在地）开会。当张景惠等人到达后，苏联卫戍司令柯瓦廖夫大将和一名中将对他们说：“目前长春局势还不算稳定，你们呆在这里很不方便。我认为你们还是到苏联去比较好。”伪满大臣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无言以对。这些战犯分作两批被押送到苏联赤塔附近一所疗养院，后转押到伯力的红河子监狱，和他们的伪帝溥仪又住到一起去了。

当时被苏军逮捕的伪大臣有：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伪军事大臣邢士廉、伪

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民生部大臣金名世、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前驻南京伪大使吕荣寰、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经济大臣于静远、伪勤劳奉仕大臣于静涛、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等人。至此，这些汉奸们便被苏军一网打尽。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无论谁侵略、无论谁卖国，最后必然要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抗日联军显身手

在苏联红军挺进东北的前后，东北抗联武装力量配合苏军在解放东北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苏联对日作战前夕，抗联教导旅，首先派出 340 名指战员作为第一批先遣支队到苏联军队中去，进行统一的军事训练。8 月 8 日宣战时，有 164 人被派到苏联第一方面军；有 80 人派到第二方面军，有 100 人派到贝加尔湖方面军，作为先头部队执行特殊的战斗任务。他们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浴血奋战，为解放全东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苏联对日宣战后，王忱亚小部队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迅速地扩建为百余人的队伍，在穆稜泉眼河消灭了陷于慌乱中的 700 余人的日军部队并与苏军会师。在东满延边地区的一支抗联小部队，数日之间便扩大为千余人的队伍，攻取村镇，有力地配合了苏军的作战。

在北满黑嫩平原，由抗联小部队扩大起来的队伍不断出击；在松花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坚持游击活动的抗联小部队，配合苏军参加了饶河、宝清、富锦、汤原地区的作战；执行侦察任务的原抗联一军军长李景荫率领的小部队主动出击，积极配合苏军作战。

抗联教导旅最后一批 400 余名指战员，即将奔赴前线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电报：“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于是抗联教导旅改变了进占佳木斯的计划，拟定了进驻东北 57 座城镇的行动方案。

同年 9 月以后，抗联部队分赴东北各地。第一批人员由李兆麟、王效明、姜信泰领队去哈尔滨、吉林、延吉等地；彭施鲁率领第二批人员去佳木斯；周保中、冯仲云率领第三批人分赴长春和沈阳；王明贵、董崇斌率领第四批人员分赴齐齐哈尔和大连。到达各地区的抗联部队，利用与苏军作战的有利条件，迅速地进驻了 8 个地区和 57 座城镇，他们以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公开身份，积极进行建党、建政工作。很快地成立了共产党的松江、黑龙江、佳木斯、牡丹江、吉林、延吉、长春、沈阳等地委组织以及各地市所属的各市委、县委等组织。

东北抗联部队所到之处，十分重视建军工作。周保中百余人飞到长春后见到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时，第一句话就说：“我要扩军，你要支援我武器。”元帅诙谐地说：“可着你的力量拿，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你拿走剩下的归我。这是我们的战利品，我们分用。”他又说：“中苏友好条约又没规定我将战利品交给国民党。所以我们只能交给它（国民党）武器库房，交给他长春市。”他还答应：“立即通知所有苏军把守的武器库，让他们只要见到你周保中批的条子，立即帮助你们运。”于是，由长春向东北 11 个大城市的卫戍副司令，下达了十万火急的命令：“抢运武器，扩充军队。”当时，抢运武器几乎是成了无声的命令。它为装备扩编新部队和从关内到达东北的我主力部队提供了重要的条件。